

俘來罷遠師—— 乾隆十全武功與《西清續鑑·甲編》 附錄

■ 余慧君

《西清續鑑·甲編》附錄，共 31 條目，詳細記載了 38 件來自帝國西部與西南部邊疆或域外的器物，分別是清國派兵進攻準噶爾、回部、金川、廓爾喀、安南等地而取得的金屬器，包括戰利品、盟軍的貢品、殖民新疆後於屯墾區發掘的古物、以及帝國成功控制新疆後鑄造的當代錢幣等。這 38 件青銅器，雖然不是當時金石古董收藏的主流，對乾隆而言，卻是十全武功的堅實證據，激發了他對帝國內外複雜多元的族群歷史想像，重要性足以匹敵其所收藏的超過四千件的漢文化青銅器。一部分附錄內的物件，陳列於為紀念十全武功而設的紫光閣內，展現帝國功勳。從著錄到展示，乾隆藉著一系列的典藏行為，演示其對大清帝國的願景規劃，乃是要壯盛宏偉如十三世紀的大蒙古帝國。

乾隆皇帝（1711-1799）的三套青銅器收藏著錄，包括《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總共記錄了 4,115 件當時清內府收藏的歷代青銅器。而在這 4,115 件青銅器中，卻有 38 件來自帝國西部與西南部邊疆或域外的特別藏品，都是隨著乾隆十全武功軍事擴張而入藏內府，分別是清國派兵進攻準噶爾、回部、金川、廓爾喀、安南等地而取得的金屬器，來源包括戰利品、盟軍的貢品、殖民新疆後於屯墾區發掘的古物、以及帝國成功控制新疆後鑄造的當代錢幣等。就功能而言，這 38 件器物裡，包括 4 件容器，9 件武器，2 件樂器，14 枚印章，和 9 枚錢幣，因為形制紋飾太過特別且新穎，無法放入商周以降漢文化脈絡下的中國歷代青銅器序列中，因此以附錄方式，置於《西清續鑑·甲

編》的最後一卷，稱之為《西清續鑑·甲編》附錄，共 31 條目。這 38 件青銅器絕對不是當時金石古董收藏的主流，但是對於乾隆而言，這些域外青銅器激發了他對帝國內外複雜的多元族群歷史文化想像，遠遠超出了漢人金石學脈絡下單一主流的青銅器傳統。乾隆將一部分附錄內的物件，特別陳列於為紀念十全武功而設的紫光閣內，展現帝國功勳，也體現了十八世紀的乾隆企圖使大清帝國如十三世紀大蒙古帝國般宏偉的願景。

與《西清續鑑》的主體一樣，附錄中的每個條目，都有器物形制線描圖，以及詳細的文字解說，內容包括時代、尺寸、來源，重要特徵等。《西清續鑑》的編輯成員包括王杰（1725-1805）、董誥（1740-1818）、彭元瑞（1733-1803）、金士松（1730-1800）、

玉保（1759-1798）、瑚圖禮（?-1814）和那彥成（1764-1833）。而王杰與董誥可能是附錄的主要編輯者，因為他們兩人在平定臺灣和廓爾喀的戰爭中都取得軍功。《西清續鑑》總共花了約十三年（1781-1793）的時間編輯完成，而附錄的編輯工作晚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以後才完成，因為其中記載安南國王阮光平（1753-1792）於乾隆五十七年獻給乾隆的貢品「安南所獻萬象鉦」與「安南所獻萬象鐃」，是乾隆銅器著錄中最晚入藏內府的青銅器物。

附錄的編輯工作，很可能是在《西清續鑑》接近完成之時倉促決定的，而且，很可能並非乾隆個人的意志。因為，乾隆於五十七年，宣布了他將於三年後，即乾隆六十年（1795）時退位的計劃，許多官員紛紛在此時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乾隆的忠誠。附錄應該也是當時南書房裡的詞臣編輯們，為取悅乾隆而集結的成果之一。

自《西清古鑑》以降，對於內府青銅器著錄體例便已固定，然而，附錄的體例卻有一處極不尋常的特徵，即所有 31 個條目中，有 16 條目恭錄了乾隆對該藏品的題詠詩文。乾隆於二十年至六十年（1755-1795）之間，分別針對個別器物，陸續撰寫了詩文，亦收錄於其詩文集中。乾隆以收藏家身份撰寫題詠詩文，勢必仔細檢視觀察器物，對於其形制、紋飾、銘文，以及如何進入清宮收藏的來龍去脈，進行說明。從某種意義上說，因為這 16 首題詠詩文，使得乾隆成為附錄的主要著作者之一。然而，將乾隆詩文轉錄在其銅器著錄上，卻是不尋常的編輯做法。因為在多達 4,115 件的青銅器著錄中，僅有 18 條目，轉錄了乾隆對該器的題詠詩文。其中，

便有 16 條目全出現在附錄中。這些題詠詩文應有關鍵意義，並非隨意轉錄，因為另外 2 件將乾隆詩文一併轉錄的條目，都是具有關鍵意義的特殊藏品。其一是《西清古鑑》卷三十九的「古銅鑑」，乾隆認為此鑑是其所有青銅藏品中最古老的、可上溯至黃帝時期，也是《西清古鑑》書名的由來。（圖 1）其二是《西清續鑑·甲編》卷十七的「周罇鐘二」，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宮造辦處新鑄造的大呂鐘，因為當年江西臨江出土了 11 件周罇鐘，乾隆視為西師奏凱之瑞應，並認定完整的罇鐘應有十二律呂，所以補齊此套周罇鐘所缺之大呂鐘。這套補齊之後的 12 件周罇鐘，最終成為清宮中和韶樂罇鐘的原型。¹ 因此，本文所討論的青銅器，對乾隆一定深具意義，否則不會將題詠詩文一併轉錄。

附錄內所著錄的 38 件器物，功能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來自回部伊斯蘭文化的精美金屬容器，乾隆在題記中仔細追溯了這些容器的歷史，企圖透過實際物件了解回部臣民們複雜的歷史文化脈絡。第二類是於戰役中俘獲的武器和軍樂器，成為紫光閣內的紀念陳列品，表明原來的使用者已卸除武裝降於大清。第三類是歷代官印，象徵大清繼承過往政權，合法統治新近內附的各族臣民。最後一類是貨幣，包括歷代舊有的以及清帝國新發行的貨幣，透過廢除當地舊制貨幣，發行「乾隆通寶」，將整個帝國置於一致的貨幣體系下。透過入藏這四類物件，象徵大清帝國逐步掌控邊疆異族的歷史文化、軍事武力、行政管理、貨幣經濟等。

以下將針對附錄內的幾件重點器物進行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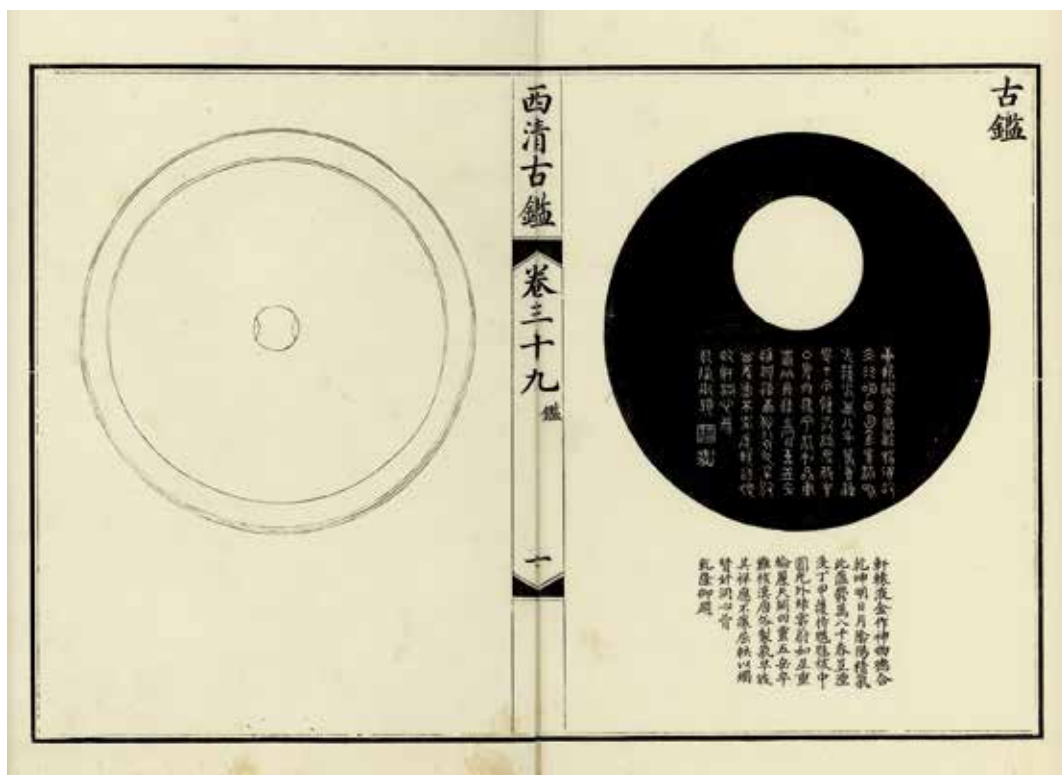


圖1 | 清 梁詩正等奉敕撰 《西清古鑑》 卷39頁1 古鑑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與準噶爾之役有關的器物

準噶爾是清初勢力最強的蒙古王國。從康熙至乾隆時期，準噶爾與清之間，已經持續近五十年的軍事衝突。為了順利掌控蒙古各部族，乾隆於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8）年間發動戰爭，最後成功取得殖民北疆的機會，並自豪地宣稱此役是「述我祖宗未竟之志事」。附錄中收錄6件與準噶爾之役有關的器物，以下選擇3件說明之。

一、元制誥之寶（圖2）

這枚於哈達圖山腳下意外發掘的大印章，重達220兩，印文為漢文「制誥之寶」與梵文吉祥咒語，鈕上刻有浮雕龍紋及一段梵文，經章嘉國師若必多吉翻譯為「陳三寶呵護吉祥臻」。根據該印章的發現地點及其銘文內

容，乾隆認為這是元順帝（1333-1367）當年離開大都倉皇逃往祖居地蒙古時留下的元朝皇家印章。乾隆對這枚印章印象深刻，分別於三十一年（1766）與六十年（1795），為其撰寫了兩篇詩文題詠。在1795年的詩文中，即將退位的乾隆解釋到，三十年前請章嘉國師翻譯印文中的梵文時，國師只能解碼字符卻不明其意。乾隆不滿意於此，特將印文拓本交理藩院請西藏學者釋義。最後，難題解決了，乾隆獲悉此梵文與漢文「制誥之寶」無關，只是吉祥咒語。

對乾隆而言，這枚被認為是元順帝遺留下來的印章，有多層次的歷史想像。首先，它提醒乾隆，曾經馳騁歐亞的蒙古騎兵仍會是當前清帝國的嚴重威脅；同時，它證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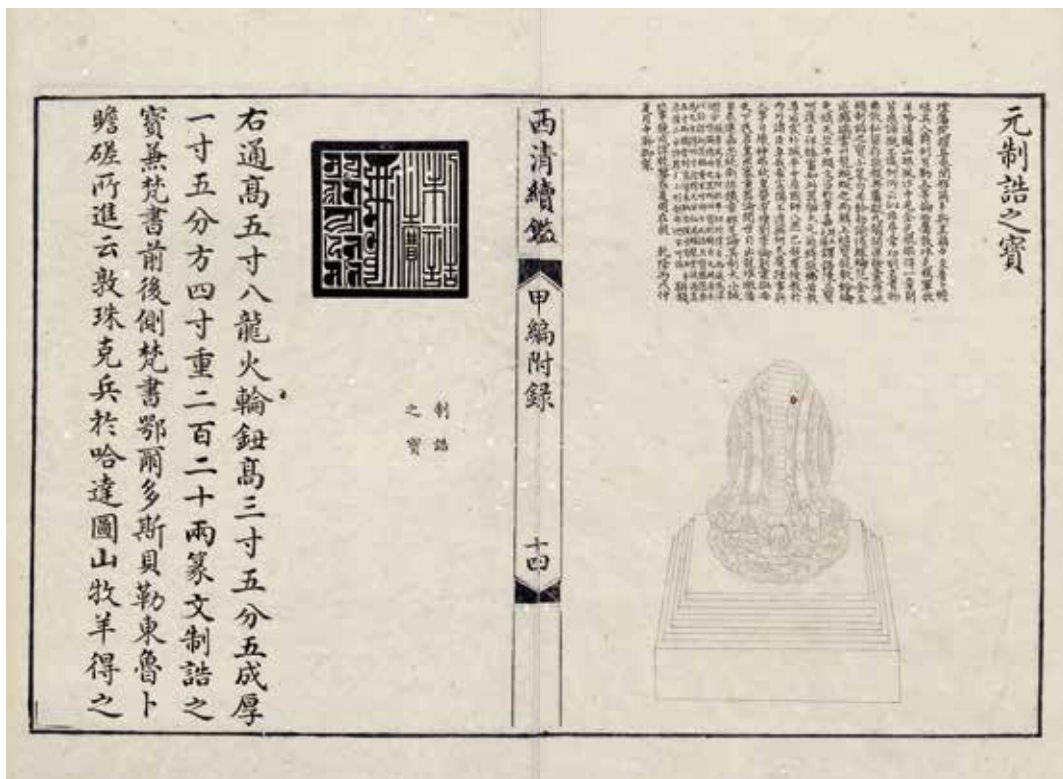


圖2 | 清 王杰等撰 《西清續鑑·甲編》 附錄 元制誥之寶 清乾隆五十八年內府圖繪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北方游牧族群依序入主中國的光榮歷史，因而有了遼、金、元、清的王朝更迭；最後，這枚青銅印章讓人自然而然聯想到傳說中的「制誥之寶」玉印。

據說，「制誥之寶」玉印最初是由秦始皇（公元前 259-210）下令製作的傳國璽。此後，中國歷朝開創者竭盡全力取得此玉印作為「受命之符」。根據十七世紀的蒙古史書記載，成吉思汗（1162-1227）出生時手中便握著這枚玉印，預示了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必然性。而清官史記載，當初皇太極（1592-1643）攻克察哈爾林丹汗（1592-1634）後，於後金天聰九年（1635）獲得成吉思汗這枚「制誥之寶」玉印，因而取得蒙古各部的支持，統一北方，繼而將國號從後金改為大清，

登基為皇帝，年號從「天聰」改為「崇德」，預示滿清取得天命，將繼蒙古後塵入主中原。儘管皇太極取得「制誥之寶」玉印的過程充滿傳奇色彩，但「制誥之寶」確實在滿蒙關係中發揮某種天命所歸的象徵作用。

乾隆對於自己取得這枚新「制誥之寶」印章，反應是理性而謹慎的，他並沒有誇大其重要性，在其乾隆三十一年（1766）寫的題記中，謙虛的以「殷鑒在夏周在殷」作結，視這枚印章為記取歷史教訓的珍貴文物，而不是作為天命象徵。畢竟，如果他又將這枚新近取得的「制誥之寶」青銅印與天命聯繫起來的話，會使得當年皇太極取得的「制誥之寶」玉印失去政治修辭上的確定性。不過，乾隆仍將這枚「制誥之寶」青銅印章視為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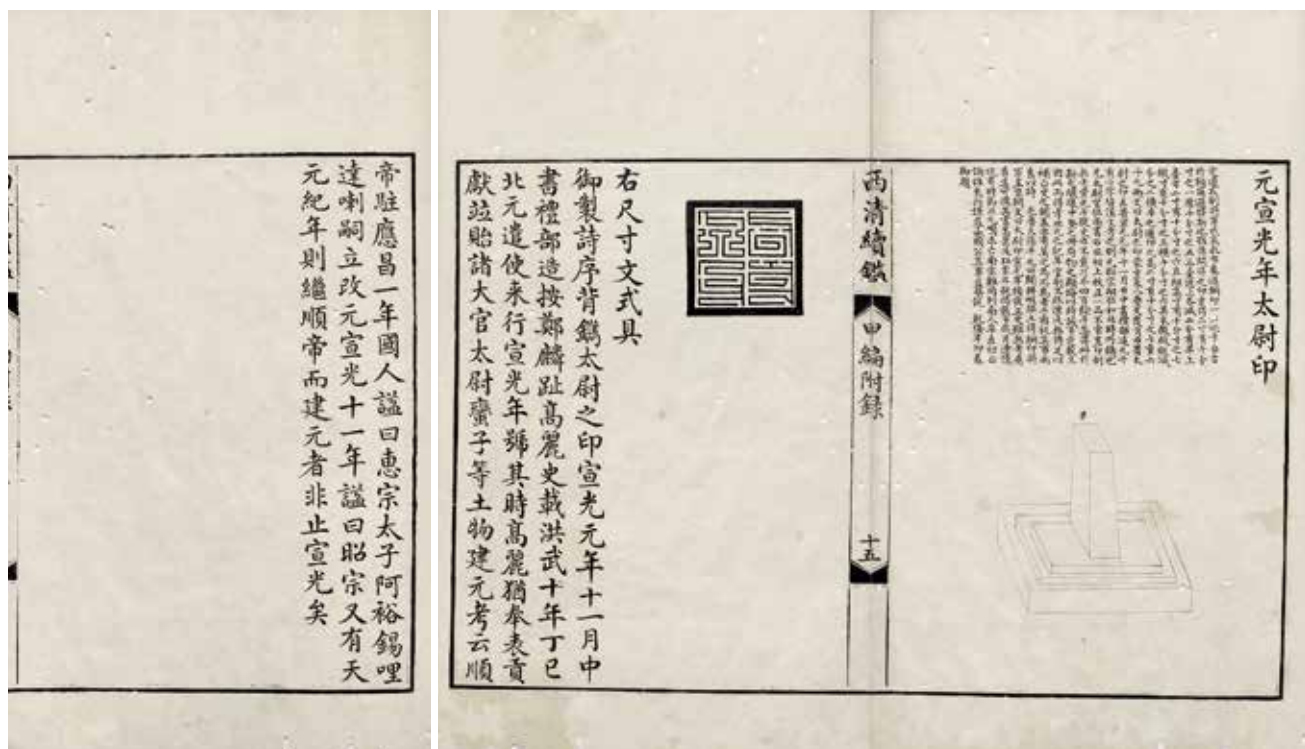


圖3 | 清 王杰等撰 《西清續鑑·甲編》 附錄 元宣光年太尉印 清乾隆五十八年內府圖繪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之重器，即使其治下的大清帝國早已無需再用「制誥之寶」確認天命所歸，但國之重器永遠不嫌多。

二、元宣光年太尉印（圖3）

此印出土於新疆北部鄂爾多斯的屯墾區耕地，現仍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印文為蒙古篆八疊文「太尉之印」，側面有兩段漢文銘文，分別是「太尉之印」，與「宣光元年十一月中書禮部造」。然而，中國歷代史書從未出現「宣光」年號。幸運的是，在高麗史家鄭麟趾（1396-1478）所撰的《高麗史》中提到，「（明）洪武十年（1377）丁巳，北元遣使來行宣光年號」。北元是元順帝在1368年放棄治理中國遷移回蒙古後重建的政權，「宣光」是順帝子阿裕錫哩達喇繼位時的新年號。亦即，明朝王室主政中國後，元

朝王室仍以王朝型態在北方蒙古延續著，與南方明朝並存。

乾隆於三十六年（1771）撰寫的題記中，說到這枚太尉印是極為重要的歷史證據，揭示了南方漢人學者所不知的四百年前北元歷史，而且「北元國未亡，南宋難同列」，因為順帝乃是放棄南方征服之地回到祖居地蒙古繼續執政，並非如當年南宋王室倉惶逃離汴京偏安江南最後亡於蒙古。對乾隆而言，北元的存在暗示了蒙古帝國與大清帝國之間未斷的歷史紐帶，從而形成了遼、金、元、清四朝未曾間斷的北方政權序列，而大清帝國乃是繼承北方政權序列並攻克明朝入主中國。這枚印章「足以補正史之闕」，是北元蒙古政權與明朝並存的歷史證據。乾隆最後在詩中抱怨如錢謙益等南方學者抱持誓說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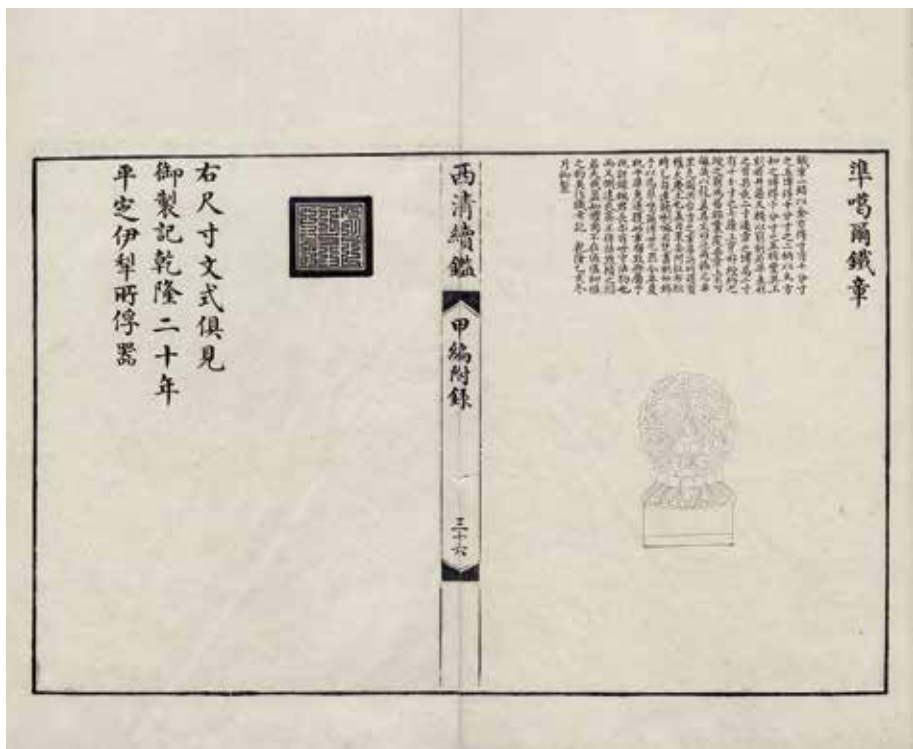


圖4 | 清 王杰等撰 《西清續鑑·甲編》 附錄 準噶爾鐵章 清乾隆五十八年內府圖繪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見，不見元明並存的史實，而身為大清皇帝的他，責無旁貸必須「折衷政論」了。

三、準噶爾鐵章（圖4）

準噶爾鐵章，是乾隆二十年（1755）清軍平定伊犁時俘獲之物，印文為梵文，漢譯為「寶權大慶王」。此印原為準噶爾王室傳世之器，最初是第六代達賴喇嘛（1683-1706）送給準噶爾第十六代可汗策妄阿拉布坦（1663-1727）的禮物。乾隆為此章寫了一篇〈鐵章記〉，文中仔細地描述尺寸和裝飾，並表示對於野蠻的準噶爾（準夷）「鑠錫君長」擁有此等「世守法物」感到相當驚訝。

當年，康熙皇帝曾幫助策妄阿拉布坦擊敗其叔葛爾丹（1644-1697）而登上準噶爾可汗大位，因而兩國之間暫時平和無戰事。然而，策妄阿拉布坦過世後，新可汗葛爾丹策凌

（1695-1745）上任，兩國戰事再起。雍正九年（1731），雍正皇帝派親信岳鍾琪（1686-1754）領軍攻打葛爾丹策凌，想要一舉拿下準噶爾，但清軍出師不力，最後兩國談判達成停戰協議。直到乾隆二十年，乾隆利用準噶爾王國內部動亂，再度發動攻勢，最終成功奪取準噶爾王都伊犁。此役使得大清在北疆得以建立長期的軍事屯墾據點。

以上三枚印章，證明了準噶爾曾經是歷史上蒙古元帝國的一部分，而當乾隆成功掌控準噶爾後，滿洲人的清帝國，名正言順的繼承了蒙古帝國當年叱吒風雲的勢力與榮光。

與回部之役有關的器物

大清成功掌控北疆準噶爾後，乾隆旋即於二十三年（1758）繼續進攻位於現今南疆

東突厥斯坦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群，並成功全面掌控回部。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南北疆因而都在清帝國的直接控制之下，即後來所謂的「新疆」。附錄內共記錄了 11 項因回部戰役而納入清宮收藏的青銅器，以下介紹 3 件伊斯蘭金屬器。

一、唐時回銅器（圖 5）

這件伊斯蘭青銅器原陳設於熱河避暑山莊內，屬清宮舊藏，並非因回部戰爭而入宮，然而乾隆在二十四年秋天，正值清軍進攻回部之時，重新注意到這件風格迥異的舊藏，並為此器寫了一長篇題詠。雖然文中並未提及自己因何注意到此件特殊器物，但合理推測，隨著清軍湧入回部，越來越多伊斯蘭風格器物進入清宮，激發了乾隆品鑑考據的興

趣，很可能以舊藏比對新獲器物，因而重新發現這件回銅器。

這件容器造型乍看類似周代青銅豆，使得乾隆在第一次看到它時誤以為是典型的中國青銅。但是，他注意到器腹上的銘文似乎是阿拉伯字母，且裝飾紋樣與常見的周代青銅器不同。因此，乾隆要求來自哈密的一名穆斯林翻譯器上銘文，但該名譯者只能粗識兩個字。乾隆因而認為，如果器上銘文讓當代穆斯林感到困惑，說明此器應是古老的器物。在沒有其他證據支持下，乾隆將此器斷為唐代（618-907）時所做，並視重新發現這件帶有阿拉伯文的舊藏青銅器為吉兆。他在評論中大膽宣稱，兆惠將軍（1708-1764）不久前才成功征服回部的兩個城市，屆時一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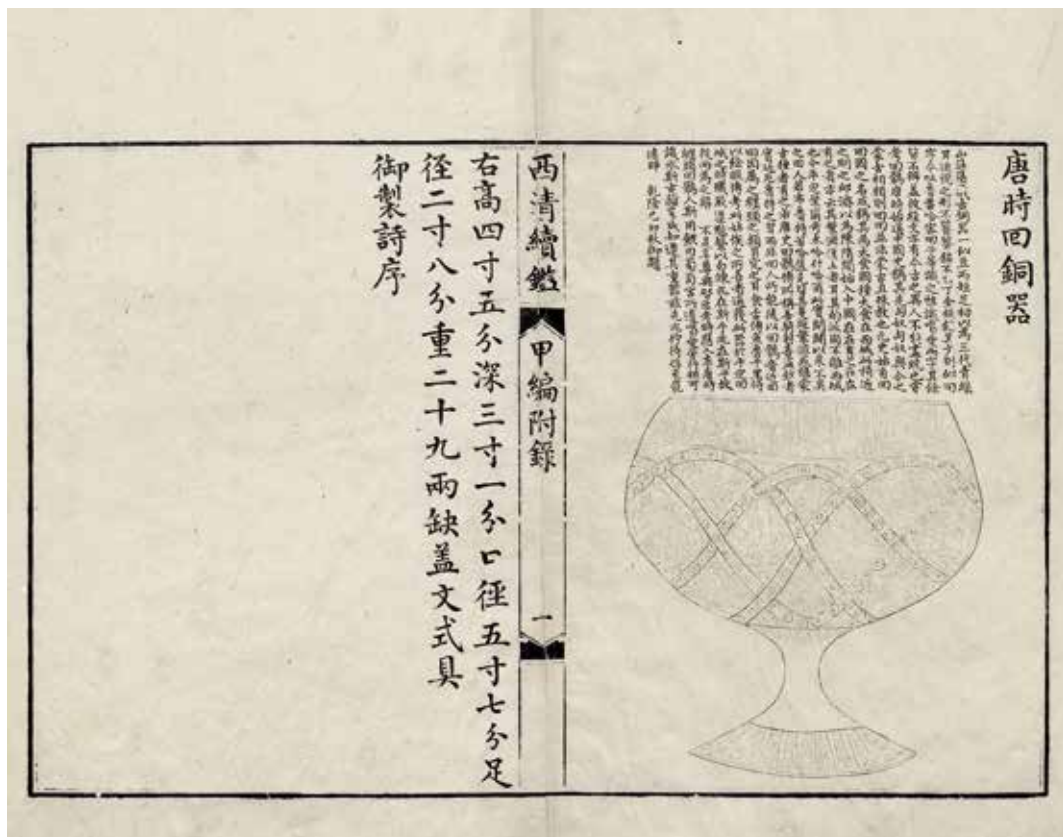


圖5 | 清 王杰等撰 《西清續鑑·甲編》 附錄 唐時回銅器 清乾隆五十八年內府圖繪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1 | 13世紀 伊斯蘭回文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6-2 | 13世紀 伊朗式盛酒器 (Iranian jām) 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 取自 Melikian-Chirvani, Assadullah Souren. *Islamic Metalwork from the Iranian World: 8-18 Centuries*.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82, plate no. 71.

會有更多的伊斯蘭寶藏進入清宮。透過入藏伊斯蘭文物，乾隆勾勒出回部的複雜歷史。雖然他的歷史推論不見得正確，但其企圖了解這片新征服土地上的人民與歷史，可視為準備治理新疆的手段之一。

這件回銅器一直陳列在避暑山莊內直到清末，目前則收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6-1），器腹上的銘文是重複的祝福語「al-aa」。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收藏一件類似的作品（圖 6-2），根據當前學者研究，它可能來自波斯，當地人稱之為 jām，是承裝酒漿的器皿，年代可追溯至十三世紀。

二、回銅噉嚙筭器（圖 7）

這個錯金銀的噉嚙筭器是回部戰役結束後，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在北京舉行獻俘禮時，將軍兆惠呈獻的戰利品之一。之所以稱之為「噉嚙筭」，應是某個外語語詞的音譯。乾隆因此為這件伊斯蘭銅器寫了一篇很長的記文。文中首先對這件器物形制進行清晰的描述，然後說明歷史考證。他請了一位穆斯林阿渾翻譯器腹上的銘文，得知此容器是蒙古元朝時，住在依楞的眉哩特木爾可汗特請沙賴子著名工匠喀馬爾為其製作。乾隆特別指出，對於回部支離破碎記載不詳的歷史，或可隨著清帝國順利掌控回疆，收集到更多史料後，將原本零散的各式記錄，整合拼湊出較詳盡的回部歷史。

此器物的確是典型的伊斯蘭金屬器，於澡堂內承裝皂液之用，阿拉伯語稱呼此器為「satl」，波斯語則稱之為「tās-e hammām」。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冬宮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 Saint Petersburg）藏有一件極為相近的器物。（圖 8）冬宮博物館的這一件有明確的銘文紀年，是 1333 年由工匠 Muhammad Shāh al-Shīrāzī 為當時主政 Fars 地區的蘇丹 Grand-Vizier of the Injū Sultan of Fars 所做。乾隆文中提到的地名「沙賴子」應該就是現今位於伊朗 Fars 省、以金屬工藝聞名的城市 Shīrāzī。很有可能，乾隆在回部所獲的「噉嚙筭」器，與冬宮博物館的現存類似收藏，皆製作於 Shīrāz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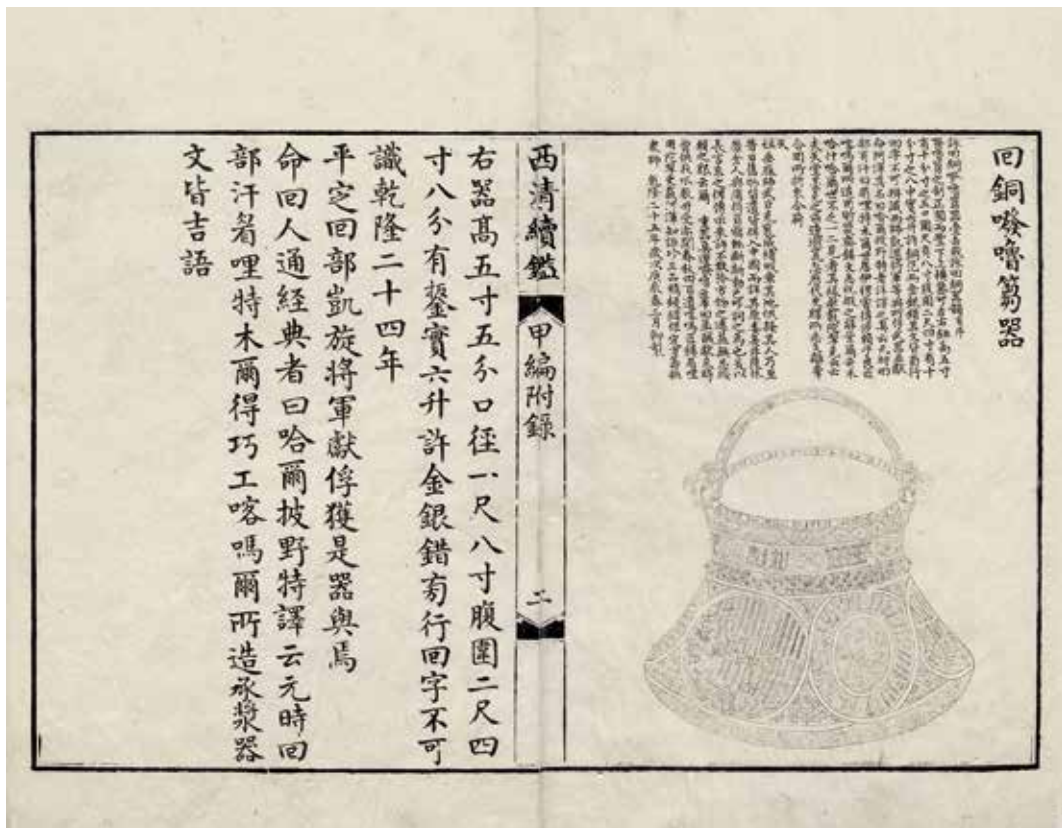


圖 7 清 王杰等撰 《西清續鑑·甲編》 附錄 回銅噉嚙筭器 清乾隆五十八年內府圖繪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1333 伊朗式提桶 (Iranian bucket) 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藏 取自Pope, Arthur Upham.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Ashya: SOPA Associates, 1938-1939, vol. 6, plate 1363b.

三、唐鼓腔尊 (圖9)

這件器物是乾隆四十一年 (1776) 於烏魯木齊屯墾區發掘出土，與之一起出土的還有其他的青銅器和陶瓷器，包括一件完整的鈎窯碗，乾隆亦為此鈎窯碗特別寫了一篇題記。利用這些出土物作為證據，乾隆認為烏魯木齊地區於十三世紀以來應該已是「耕也相望廬井阜而倉廩實」的富裕狀態了。

「鼓腔尊」一詞承襲自明代高濂 (1573-1620) 《遵生八箋》內記載的一件類似器物。針對這件「鼓腔尊」，乾隆將其製作年代追溯至唐朝 (618-907)，因為北庭大都護府曾於烏魯木齊設後庭縣，他認為在唐代設縣之前，烏魯木齊居民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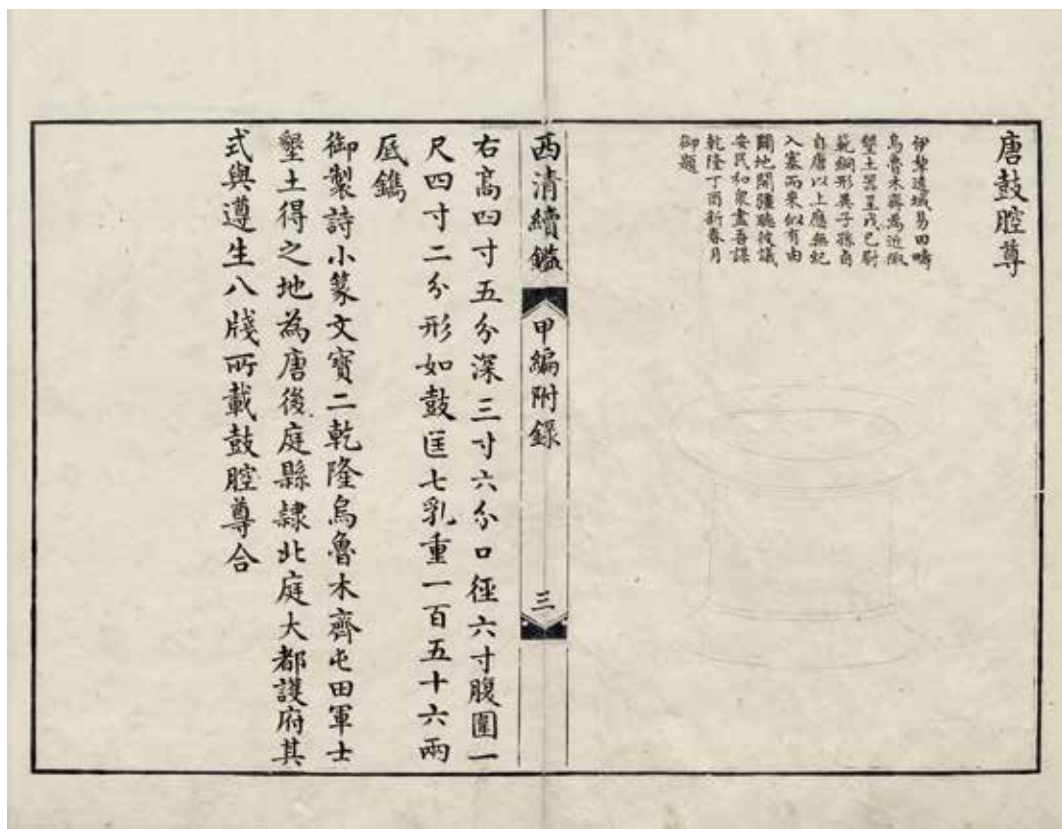


圖9 清 王杰等撰 《西清續鑑·甲編》 附錄 唐鼓腔尊 清乾隆五十八年內府圖繪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能有資源與技術製造出如此精美的青銅器。乾隆評此鼓腔尊入「古上等」之列，並陳設於乾清宮內，可見對其重視程度。

我們現在知道，這類器物應是自十三世紀以來，流行於波斯地區、稱為 *hāvan* 的研鉢器皿，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收藏有類似形制的器物，其裝飾可樸素簡單或華麗繁複。（圖 10）而乾隆收藏的這件裝飾極為樸素，可能是當時烏魯木齊地區普通家戶所使用。



圖 10 13世紀早期 伊朗研鉢器 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 取自Melikian-Chirvani, Assadullah Souren. *Islamic Metalwork from the Iranian World: 8-18 Centuries*.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82, plate no. 67,110.

特別的是，乾隆於四十二年（1777）為鼓腔尊題的詩，共 65 字與兩枚收藏印，一併鑄刻在此器底部。這首詩描述了如何獲得鼓腔尊，並指出其與典型中國古代銅器的差異，最後以「闢地開疆聽彼議，安民和眾盡吾謀」作結。作為一位收藏家，乾隆在其藏品上的確留下大量個人文字，特別是書畫。儘管他也喜歡在玉器和陶瓷等堅硬材質上留下文字，卻極少在古代青銅器藏品上鑄刻個人詩文與收藏印，因為青銅器銘自來便是製器者為歌頌家族祖先功績，或為表明「自作用器」而鑄刻。後代文人收藏家認為不宜在古代青銅器上鑄刻自己的詩文，因此，乾隆對古代青銅器的題詠，通常會刻在木匣木座，或書寫在冊頁上，與該器物一起收藏於匣內。目前，無從得知乾隆何以特別針對鼓腔尊鑄刻個人銘記，但可以肯定的是，乾隆必定甚為重視這件鼓腔尊，因為另一件刻有乾隆銘文的古代青銅器收藏，正是前文提過的《西清古鑑》卷三十九中記載的「古銅鑑」。（見圖 1）

與金川之役有關之物件

針對四川西部的羌族部落，乾隆共發動了兩次大型戰役，第一次金川戰役發生在乾隆十二至十四年（1747-1749）；第二次則是乾隆三十六到四十一年（1771-1776），由親信阿桂（1717-1797）領軍，歷時六年，是乾隆發動的各個戰役中，歷時最長，耗費鉅資的艱困戰役。一開始，乾隆認為西羌部落的戰鬥實力，絕對不可能與大清八旗軍相提並論，結果出乎意料之外，這場戰爭卻無法如乾隆預期的速戰速決，即使清派出十萬大軍，西羌僅有一萬五千名左右軍力，戰事竟然拖延長達六年，乾隆投入的軍費飆升至七千萬

兩，可說是一大挫敗。第二次金川之役終於告成後，清軍俘獲了約百件戰利品，全部入藏紫光閣，附錄內記載了其中 7 件金屬器皿，包括 1 件金川蕃劍（圖 11），6 枚明代土司制度遺留的官印。

與安南之役有關的物件

最後，介紹一對由安南國王阮光平（1753-1792）進獻的寮國軍樂器——鉦與鐃。（圖 12、13）乾隆五十年（1785），安南爆發內戰，阮光平推翻了黎朝末代皇帝黎維祁（1765-1793）。黎維祁逃往清國尋求軍事支援，乾隆因此派兵，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擊退阮光平，助黎維祁重登王位。但不久之後，黎維祁仍無力執政，再度被阮光平打敗，

黎棄國逃亡。這一次，乾隆不再支持黎維祁，轉而扶植已稱帝的阮光平。阮提出和平協議，承諾兩年一度進貢大清皇帝，四年一度派使節團前往北京朝貢。所以乾隆於五十四年（1789）正式冊封阮光平為安南國王，承認阮式王朝。阮光平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親自前往北京向乾隆獻捷朝貢，貢品中包括此對鉦與鐃，是阮統一安南過程中，戰勝萬象國（現今寮國中部）俘獲之戰利品。乾隆視阮光平之軍功為大清帝國武功的延伸，亦將此對軍樂器陳列於紫光閣內。

結論

附錄中的 38 件青銅器，數量雖少，卻使乾隆的所有青銅器收藏，從最古老的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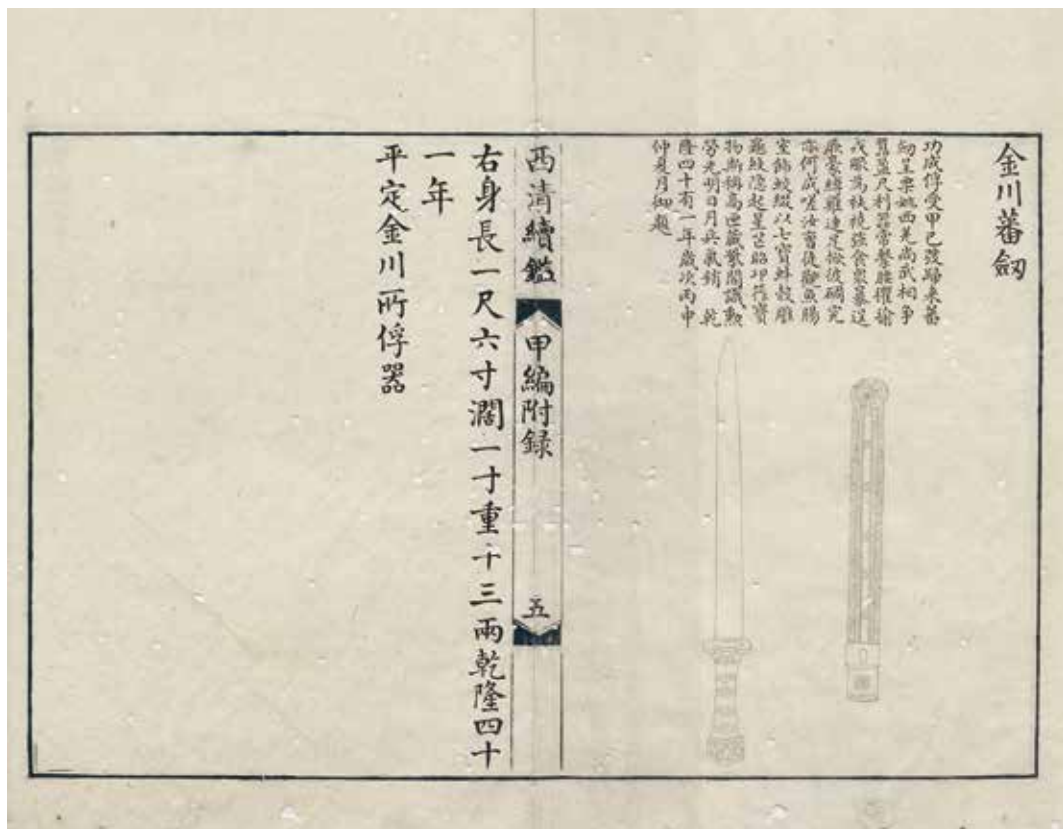


圖 11 | 清 王杰等撰 《西清續鑑·甲編》 附錄 金川蕃劍 清乾隆五十八年內府圖繪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安南所獻萬象鉦



西清續鑑

甲編附錄

十二

右圓徑一尺八寸五分浮漚高一寸三分徑四寸匡深二寸六分重一百五十兩乾隆五十七年安南國王阮光平與萬象國戰勝獻捷恭進按聶崇義三禮圖鉦即鐺而杜佑通典謂近世有如大銅疊縣而擊之以節鼓呼曰鉦此器又似文獻通考所謂浮漚器隨其土俗名之亦以鑒旅貢之誠耳

圖 12 | 清 王杰等撰 《西清續鑑·甲編》 附錄 安南所獻萬象鉦 清乾隆五十八年內府圖繪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安南所獻萬象鐺



西清續鑑

甲編附錄

十三

右圓徑一尺二寸匡深四分重一百四十八兩乾隆五十七年安南國王阮光平戰勝萬象國獻捷恭進按聶崇義三禮圖金鐺形似鐘此乃如文獻通考所謂打鈔鐺者亦隨其土俗名之

圖 13 | 清 王杰等撰 《西清續鑑·甲編》 附錄 安南所獻萬象鐺 清乾隆五十八年內府圖繪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黃帝時期古鑑，一直延續至最晚的「乾隆通寶」，串連起一套以青銅器展現的文明發展史。透過歷朝歷代青銅物件，乾隆不只為大清帝國蒐集臣民與土地資源，也蒐集了臣民的過往歷史，使得大清帝國治下的時間縱深與空間廣度持續擴張綿延。對於不同文化脈絡的青銅器，透過分類、整理、依品相評定等第以入藏內府，構成一套完整的典藏過程，正如典藏不同族屬的臣民與土地，分類、整理、測繪，然後依親疏遠近關係納入大清帝國朝貢體制內。

對於西清著錄主體中大量的漢文化青銅器收藏，與附錄中來自帝國西部與西南部邊陲數量甚少的異域青銅器，乾隆的典藏態度與過程卻相當一致。他並不認為清宮內超過四千件的漢文化青銅器就比附錄中僅有的 38

件異域青銅器來得更重要。對他而言，如同所有異族一般，漢族只是數量多、文化程度高、需要其更努力掌控的「他者」臣民，亦非「我族」滿洲臣民。入藏數量越多，反而越能顯示他已成功地掌握漢族臣民以及其過往歷史。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乾隆似乎更謹慎的對待這僅有的 38 件附錄青銅器，為其創作了更多的詩詠題記。畢竟，乾隆是藉由歷代眾多金石收藏家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坐享其成，擁有四千件以上的漢文化青銅器；但是，這 38 件附錄青銅器入藏內府的過程，卻是他親自創造一次次的當代軍事政治事件，藉著八旗鐵騎長年南征北討，才打造出屬於自己的盛世。

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副教授

註釋

1. 關於此套周鈔鐘及其複製品的研究，見余慧君，〈遵律度於無疆——《皇朝禮器圖式》樂器卷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3 期（2020.5），頁 104-111。